

A Brief History
The "Female Diocesan School", Hong Kong,
1860 — 1869
And Beyond

女仔館興衰
香港拔萃書室^(的)史前史
1860 — 1869

陳煌舜 方穎聰



目次

序：閱讀「女仔館」／馮以浤	008
自序：好古靈魂曰字樓／方穎聰	012
時間簡表	018

楔子

往復於 1860 與 1869	022
-----------------	-----

上編

女仔館始末：香港早期雙語教育史的一隅

引言	048
第一章 女仔館的創建動機	051
第二章 女仔館前期（1860–1865）	072
一、畢士泰、韋以信與伊頓	072
二、女仔館前期的學生	094
三、女仔館前期面臨的社會壓力	109
第三章 女仔館後期（1865–1868）	126
一、岳士列掌校	127
二、女仔館後期的學生	145
結語	153





中編

女仔館餘緒：香港早期女性教育的進程

引言	160
第一章 曰字樓孤子院的肇端	162
第二章 從男女館到男校	178
一、轉型男校的決定	179
二、1878 年的轉型風波	185
三、曰字樓學生的種族情況	197
四、女生部的裁撤	203
第三章 飛利女校與拔萃女書室	220
一、飛利女校的淵源	220
二、轉學飛利的曰字樓女生管窺	228
三、拔萃女書室的成立	234
第四章 從女仔館到女拔萃的統緒	246
一、何東諸女的求學情況	252
二、雙語教育時代的開啟	259
結語	268





下編

女仔館記憶：兩所拔萃書院的早期歷史敘事

引言	278
第一章 拔萃男書院對女仔館的歷史記憶	280
一、十九世紀的記憶	280
二、俾士校長的記憶	288
三、費瑟士東與舒展時期的記憶	293
四、戰後的記憶	301
第二章 拔萃女書院對女仔館的歷史記憶	308
一、史及敦、費格遜時期（1900–1925）	309
二、蘇雅、吉賓思時期（1925–1941）	321
三、Founder's Day 的名實演變	327
四、1950 年代以後	336
結語	351
附錄	
附錄一：女仔館相關紀事	358
附錄二：女仔館校董會成員名單	373
附錄三：女仔館校名及主事	375
附錄四：女仔館師生小考	376
附錄五：日字樓孤子院女生註冊表	385
附錄六：歷任會督簡介	387
附錄七：男拔萃相關人物簡介	391
附錄八：女拔萃相關人物簡介	396
拔乎其萃——開埠以來香港女性雙語教育的艱難進路	400
參考書目	409
後記 / 陳煒舜	415





序 閱讀「女仔館」

進入 19 世紀，經過工業革命的洗禮之後，歐美國家日漸強大，而中國則因清政府顛頽無能，而又狂妄自大，因此經常受到外國的欺侮和侵略。1839 年，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繳獲英商走私鴉片，在廣州虎門加以銷毀。1840 年，英國發兵攻打中國，迫使清政府於 1842 年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1860 年，英法兩國又借故進軍北京，迫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其中一項條款是把九龍半島割讓給英國。

屈辱激起了國人發憤圖強的決心。1860 年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奕訢等洋務派興起，推行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在北京成立同文館（北京大學前身）、在各地設立新式學堂和派遣學生出國留學。但現代化的學校教育制度則要到 20 世紀初才建立起來。

歐洲也是近期才出現我們所認識的現代學校教育。西方社會譽為現代教育之父的康米紐斯（John Amos Comenius）是捷克人，生活於 17 世紀。他當過教師、校長和牧師，一生致力教育。他大力推行學校教育，認為所有人，不論性別，都應接受



12 年的學校教育。他的教育理念包括：學校的課程應該和生活結合，而且清楚易懂；學習要結合觀察和實踐；學生要先學好母語才學外語（指拉丁語）；學習是不可強迫的，一切都要順其自然。

英國雖然早在 14 世紀便已成立了溫徹斯特公學（Winchester College），但因為當時的政府還沒有確立一套教育系統，只靠為數甚少、主要是由教會辦理的私立公學，因此有機會入學的青少年簡直是鳳毛麟角。這些公學的畢業生大部份升讀早年成立的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工業革命之後，社會日漸富裕，這類私立學校的數目也隨着增加，而政府也在 19 世紀上半頁開始注意到青少年的教育問題，進而逐步建立起一套教育制度。這時，英國的學校教育主要還是由教會提供的。康米紐斯的教育觀在過程中多少也影響了英國教育的發展。與此同時，受到來自歐陸的激進思潮所影響，英人重視女子教育的呼聲也在社會上高唱入雲。

英人佔領香港之後，自然在各方面的管治上都引用祖家的模式，教育也不例外。因此，香港早期的教育事工主要落在基督教（又稱新教， Protestant）和天主教（Catholic）身上。開埠那年，馬理遜學校（Morrison School）便從澳門遷來香港了。次年（1843），英華書院也從馬六甲遷到香港來。聖公會則分別在 1851 年成立（其實 1849 年便已開始收生和授課）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和 1860 年成立「女仔館」（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或譯「拔萃女子訓練學校」），而天主教會也分別在 1854 年和 1860 年成立聖保祿學校和聖心書院。最早的政府學校是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它要到 1862 年才出現。

「女仔館」的成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為聖保羅書院的畢



業生提供賢內助。可惜事與願違，數年下來，因為學校聲譽欠佳，以致員生不足，社會各界的支持也日見委縮。到 1868—69 年度，知道已無法繼續支撐下去了，便決定停辦。停辦之後，原址改作曰字樓孤子院 (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初期男女兼容，後來會督認為應該只收女生，但代表商界的校董卻堅持如果只收單一性別的學生，則應該只收男生。爭辯的結果是代表商界利益的一方獲勝，孤子院於是逐步由兼收男女宿生變成只收走讀女生，再過渡到完全不收女生。1892 年，所有女生都在轉到 1886 年成立的飛利女校 (Fairlea School，今協恩中學) 去。1900 年，拔萃女書院註冊，重新開辦。隨後數十年，因着形勢的轉變，孤子院曾幾度改名：1892 年拔萃書室 (Diocesan School and Orphanage)，1902 年拔萃男書室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最終在 1930 年代確定為拔萃男書院 (Diocesan Boys' School)。其實，早在 20 世紀初，因着拔萃女書院的成立，學校與外界的書信來往，很多時都用上了拔萃男書院這個稱謂。

拔萃男女兩所書院早期的歷史錯綜複雜，甚至可說撲朔迷離。2007 年，陳慕華和我應邀編寫拔萃男書院歷史時，我們對它們 19 世紀的歷史感到有點難以處理，特別是 1860—1869 那幾年。躊躇之際，幸好很偶然地認識了陳煒舜校友，並且知道他和另一位校友方穎聰正在收集和整理這段歷史的資料。承蒙他們提供這些資料，使到我們的困惑很快就得以解除。

十二年後，欣聞他們在過去的年月裡，精益求精地不斷追蹤「女仔館」的歷史，致力尋求真相和梳理紋路，並寫成〈女仔館始末〉、〈女仔館餘緒〉及〈女仔館記憶〉三編，合為一書。據我所知，此書原始材料搜集以穎聰居功為多，文稿撰寫則以煒舜為主；至於材料的解讀、文字的斟酌，則尤賴二人協作之力。





相信這本書對認識以至研究拔萃男女兩書院的來龍去脈都有很大的幫助。

早前煒舜來電，約我寫序。這本書寫的都是與拔萃有關的歷史。身為男拔校友和校史的撰稿人之一，而且在編寫這本校史時借用過他們的資料，豈有不從命之理？

尹以深

2019年香港多事之秋





自序 好古靈魂曰字樓

在此處——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香港特藏專區——來回顧這一切的開端，對於我來說應當是最合適的。此地到般咸道官立小學 (Bonham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只需要步行幾分鐘，那裡曾經座落着女仔館 (Female Diocesan School)，以及其後曰字樓孤子院 / 拔萃書室 (Diocesan Home & Orphanage) 的校舍。

距離香港特藏專區更近的是聖保羅書院 (St. Paul's College)。該校為從前的飛利樓 (Fairlea) 舊址所在地，莊思端女士 (Ms. M. E. Johnstone) 曾將其用作女子教育協會 (Female Education Society) 傳教所和她的「小型寄宿學校」。女仔館的伊頓女士 (Ms. M. A. W. Eaton) 和岳士列女士 (Ms. M. J. Oxlad) 也會偶爾造訪該處。

2005 年的一個晚上，我從煒舜 (本書合著者) 那裡得聞關於拔萃男書院創校年份爭議的故事。如今回顧過去，這樣的爭論根本不足為奇——幾十年來被視為學校「歷史」的，泰半只是神話、傳說和軼事，世代相傳。





那時，我剛完成數學專業的學位論文（可能只有我的指導教授和口試委員才會費心閱讀），正在琢磨下一步怎麼走。換句話說，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滿足自己軀體內那個「好古之靈魂」（antiquarian）的求知慾。因此，我開始搜集拔萃男書院（Diocesan Boys' School）的戰前資料。與香港大學——那個我曾擔任助教之處——馮平山圖書館的香港特藏專區相比，還有哪裡能夠算得上是更好的起點呢？

我發現的第一件藏品大概是男拔萃第三任校長費瑟士東（Rev. W. T. Featherstone）主編的拔萃校史影印本，原書出版於1930年，係為「六十週年校慶」而編纂。此書足以澄清（有時是確認，更多時候是糾正）幾代拔萃男生關於曰字樓孤子院／拔萃書室口耳相因的傳說。後來，當馮以浤先生的團隊啟動男拔萃校史撰寫計劃後，此書更發揮了很大的功用。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費瑟士東校史還為我打開了另一道門。此書扉頁的完整書名中，副標題是這樣的：“with reference to an earlier Institution, called the 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 founded in 1860.”（以一所成立於1860年、名為女仔館的前身機構為參照。）我當下的反應就是想探究，為什麼費瑟士東校長要勞神將另一所早已不復存在之學校（姑勿論還是一所女校）的材料納入其書？我的疑問幾乎是立刻便得到了答案。在〈會議紀錄摘要〉中，我們知悉曰字樓孤子院董事會在1878–79年作出了的重大決定，其中幾項對該校產生了永久的影響。唯有以女仔館為背景，這些決定方能得以理解。

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這所「前身機構」使我感到好奇。在這方面，對於像我這樣的一個入門者，費瑟士東校史給出的謎題卻每每多於答案。舉例而言，費史只錄入了女仔館的第一





份年度報告（1860–61 年度）。至於〈會議紀錄摘要〉中，遺漏的比包納在內的項目更令人印象深刻。緊隨其後的是某些事件的相關報導，篇幅委實不成比例。單憑這些資料，似乎甚難迴避以下結論：女仔館成立時眾望甚殷，而竟以失敗告終。然而當中的本末因由，卻因費史那種「斷爛朝報」般的缺漏而變得難以理解。幸運的是，費瑟士東校史中的材料仍為探索的開展提供了充裕的資訊：這包括了〈會議紀錄摘要〉中各個項目的日期，以及與該機構相關的各個傳教士的姓名。

在香港特藏專區，港府藍皮書（*Government Blue Book*）的影印本就存放在距離費瑟士東校史不遠之處。在費史以外，這是我所覓得關於女仔館的第一筆資料。藍皮書中「教育」一欄的績效部分，提供了女仔館的收生情況和財務狀況，並且收錄了校方在每年年底為該校加以簡介。霎時間，費瑟士東校史中關於女仔館的材料顯得更有意義了。而負責績效匯總的港府官員將女仔館的條目與其他諸機構的條目綰合一處，還令我們明瞭該校如何與其他機構（和個人）互涉互動。

對讀比勘費瑟士東校史資料與藍皮書條目，呼之欲出的是：對於女仔館而言，1865 年意味着「危急存亡之秋」（*annus horribilis*），此後再也沒有恢復元氣；而該校承受的不幸，則是與「向華籍女生講授英文」有關。那幾年也好，此後很長的一段歲月也好，港府所編印之《轅門報》（*Government Gazette*）內教育報告的引述與暗指，都進一步強化了這個猜想。後來我了解到，這個「危急存亡之秋」在香港教育史研究者之間眾所周知的。

不過，還是有一些地方讓人感到「不對勁」。費瑟士東校史中的〈會議紀錄摘要〉似乎暗示着至少有一部分傳教士（例如伊頓女士）很早就意識到某些錯着：並非一切都像女仔館的首份





年度報告所呈現的那般，瑰麗而美好。如此說來，該校的失敗真是一個「坐待之斃」(accident waiting to happen)嗎？

更糟糕的是，假如女仔館原本的計劃是註定要失敗的，那麼 1878 年包爾騰會督 (Bishop J. S. Burdon) 將曰字樓孤子院恢復成原先女仔館的打算，我們又要作何解釋？

又或者，女仔館的所謂「失敗」，只不過是費史的缺漏（加上《輶門報》內教育報告的引述與暗指）所導致的過份簡略的解讀？

因此，我着手去尋找傳教士——特別是那些與該校有直接聯繫的傳教士，在當時或此後的言論紀錄。

這使我接觸到各個宣教社團的檔案庫——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此等檔案庫的微縮膠卷版本。這些膠卷都存放在香港特藏專區一個特殊（而且寒涼）的房間裡。自然而然地，我開始搜索女子教育協會的資料，後來又將搜索範圍延伸到英國海外傳道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的資料。畢竟，與這所學校有關的傳教士都來自這兩個團體。

在接下來的十五年中，搜索工作依然在斷斷續續地進行着。而搜索的範圍也擴大到其他的檔案庫。由於許多有用的檔案庫都已經數位化，能夠在線閱讀，使我得以在家工作。有時，要感謝該範疇的前輩專家們在著作中給予的提示，使搜索變得更有效率。越來越多的史料被發現了。其中有一些直接與女仔館有關，另一些則與未來幾十年「餘緒」有關。

有些材料非常具有揭示性和啟發性，例如柯爾福會督 (Bishop C. R. Alford) 的 *China and Japan: a Charge*，以及歐德理博士 (Dr. E. J. Eitel) 關於廣東博羅學校的通函。有些材料令人動容，例如岳士列女士的信件。有些材料會瞬間吸引人們的眼球，例如女教會期刊 *Female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中的若干木刻畫。但是，也有些材料內容需要移時之功才能辨識，例如施美夫會督（Bishop G. Smith）和華倫牧師（Rev. C. F. Warren）信件中的筆跡。而二十世紀前期的幾十年留下了為數不少的文件，性質各異，但都讓我們了解到：女仔館的故事是怎樣在反覆講述後逐漸失真，最終導致了拔萃書院創立年份的爭議。這樣一來，我們的探究歷程便在繞一大圈後回到了原點。

2018 年，當搜索、辨識、解讀和討論等工作累積到一個階段，煌舜和我都認同：將這些發現形諸著述的機緣已逐漸成熟，是時候讓我們為女仔館寫下一個具有連貫性的故事了。我們會解釋該校如何、又為何難副創始人之厚望，進而論述此後數十年中，女仔館的使命怎樣由各所學校接力傳承。近日，這本著作終於脫稿。我們過去若干年的工作內容，會在此書中得到全面的呈現，還望各位讀者不吝指正。

方穎聰

2021 年 5 月 21 日

時間簡表

女仔館（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在雅彬彌臺正式成立，收錄中上階層華籍女生。

女仔館改組，華籍女生不得學習英文。翌年初增設英文部，收錄混血孤女。學校改名 Diocesan Female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School。

曰字樓孤子院（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在女仔館原址成立，兼收混血、歐裔及華裔之男女生。

曰字樓孤子院決定收錄之女生只限於日校。另一方面，也開始在男校收錄華籍日校生。

1859

1859年1月18日，施美夫會督夫人（Mrs. Lydia Smith）在聖保羅書院內為香港華籍女童開設了一所小型日校，該校最終發展成1860年開幕的寄宿學校「女仔館」。

1860

1863

女仔館般咸道新校舍落成。

1865

1868

女仔館結業。

1869

1877

曰字樓孤子院成為補助學校。

1879

1882

曰字樓孤子院將中文名稱改為拔萃書室。



約在本年或翌年，莊思端
(Margaret Elizabeth
Johnstone) 的女子寄宿
學校遷往飛利。

拔萃女書室 (Diocesan
Girls' School and
Orphanage) 在般咸道致
瑰行正式開幕。飛利女校
將 24 名混血女生轉入女
拔萃。

女拔萃遷往九龍皇園
(King's Park) 。

男拔萃遷往九龍旺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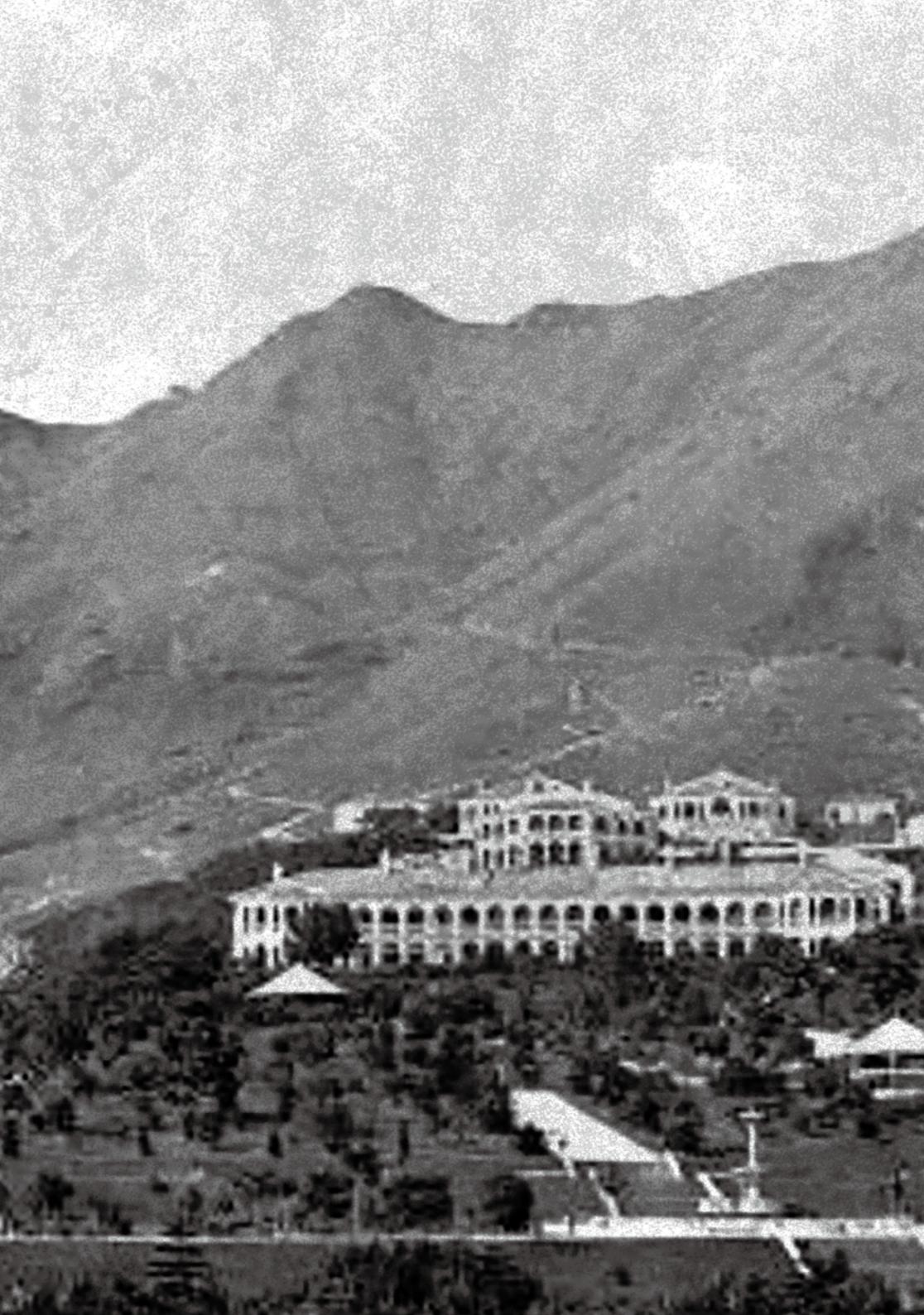
1883 飛利女校 (Fairlea
School) 的前身在西尾里開
辦，開始為曰字樓女生提供
住宿。

1883
所有曰字樓女生轉入飛利，
拔萃書室成為男校，英文
名稱改為 Diocesan School
and Orphanage 。

1900
1902 拔萃書室改名拔萃男書室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 。

1913
1921 女拔萃開始收錄華籍學生。
1926

1939 女拔萃開設中文科。





楔子



往復於 1860 與 1869



在物質生活充裕的今時今日，香港的中學一般都會為逢十校慶安排活動，成立於 1869 年的老牌名校拔萃男書院也不例外。從 1969 年的百週年校慶至今，幾乎每十年都有大型慶祝活動。而在此以前，由於社會動盪、戰爭頻仍，乃至校方自身的安排，逢十校慶往往沒有活動。以二十世紀上半葉為例：1919 年時值一戰結束、學校更換校長，未有慶祝；1939 年因抗戰爆發，香港風雨飄搖，未有慶祝；1949 年因二戰結束、大陸易幟，也未大肆慶祝，只是在校刊中提及而已。比較值得注意的一次，乃是 1929 年的金禧校慶。當時男拔萃剛從逼仄的港島般咸道校舍遷往廣闊的旺角新校，不僅舉行了一連串慶祝活動，還首度編纂了校史。至於戰後，唯一未有活動的一次逢十校慶在 1959 年。現存校方資料、舊生記憶中，沒有任何關於九十週年校慶的資訊。次年，拔萃女書院





卻高調舉辦了百年校慶活動，與男拔萃的靜默形成極大反差。

當時，男拔萃的校長是來自本地混血社群的施玉麒牧師（Rev. George Zimmern, 1904–1979, 1955–1961 在任）。他於 1914 年至 1921 年間就讀男拔萃，1955 年秋成為首位接任校長的舊生，又長期供職於聖公會，對於校史非常熟悉。正因如此，他在九十週年校慶沒有任何舉措，就更啟人疑竇了。有趣的是當年 10 月 31 日，拔萃男書院第五次舉行年度懇親賣物會（School Fete）。開幕式上，怡和洋行大班巴頓先生暨夫人（Mr. & Mrs. H. D. M. Barton）受邀為主禮嘉賓。施牧致詞道：

This School was founded in 1860— for the girls and not for boys. But as girls' school it was a failure, because there were not enough girls to make it pay. The School Committee led by the Bishop decided to close up but on the Committee was the Hon. William Keswick, head of Jardine's, and he took the lead in guaranteeing the funds to carry on.

Mr. Keswick remained to be Hon. Treasurer of the School for nearly 20 years—from 1869–1886—except for those periods when he was on leave in Eng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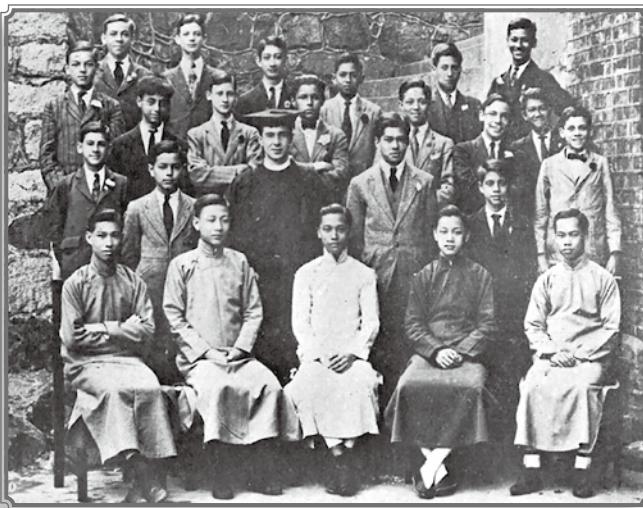
From 1869 when Mr. Keswick saved the School from extinction, until now, the School has grown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committee on which sits a member of Jardine's.¹

¹ “Big Gathering at School's Fete: Close association between D.B.S. and Jardin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st, 1959.





巴頓夫人（怡和洋行大班之妻）在 1955 年男拔萃首屆賣物會上作開幕致詞。後坐右起第四人為施玉麒校長。



1921 年，男拔萃代理校長史騰牧師 (Rev. A. J. Stearn) 與部分學生合影於般咸道校舍，後排右二為施玉麒。



這所學校始建於 1860 年——錄取的是女生而非男生。但它作為女校是失敗的，因為錄取不到足夠的女生來支持營運費用。由會督領導的校董會決定結業，但當時怡和大班耆紫薇是校董之一，他率先保證了資金的永續。從 1869 年到 1886 年，耆紫薇先生擔任學校司庫近二十年——除了他休假返英的時段。從 1869 年耆紫薇先生把學校從結業中拯救出來，直到如今，我校在校董會的指導下日益壯大，而校董會裡總會有一位怡和成員。

對於早期校史的敘述，施牧所言大致不虛。如 1869 年時，柯爾福會督 (Bishop Charles Richard Alford, 1816–1898, 1867–1874 在位) 便對 1860–1868 年間存在過的那所號稱「女仔館」(Female Diocesan School) 的女校評價甚低：

The FEMALE DIOCESAN SCHOOL has, I regret to say, proved an almost total failure in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Girls. When, with the advice of the leading Gentlemen in the Colony and those most interested in its welfare, I took the School last February under my exclusive superintendence, I found it seriously in debt and in much disfavor. I regarded its resuscitation as an Anglo-Chinese School for Native Girls as neither possible nor desirable.²

² Alford, Bishop C. R., *China and Japan: a Charge, Delivered in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St. John, Victoria, HongKong, February 2nd, 1869*, Hong Kong: London: Noronha & Sons; Seeleys, 1869, pp.56-57.



我很遺憾地說，女仔館對華籍女童而言幾乎是徹頭徹尾的失敗。基於當地官紳及關心本地發展之人的建議，我於去年二月全權接管該校。當時我便認識到學校深陷債務，且校政不見起色。在我看來，該校若繼續作為一所面向本地女童的中英雙語學校，是既不可能又不被看好的。

四年後，港府視學官史釗域 (Frederick Stewart, 1836–1889) 對女仔館的情況仍記憶猶新：

The educating of Chinese girls in English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disastrous experiments which the Colony has ever witnessed.³

向華籍女孩教授英文是殖民地有史以來最災難性的實驗之一。

使用「災難性」一語，比「失敗」更為嚴重。回觀柯督所言「當地官紳及關心本地發展之人」，應包括怡和洋行大班耆紫薇 (William W. Keswick, 又譯祁士域, 1834–1912) 在內。1949年7月號的校刊 *Steps* 中，編者的話以“*Our Eightieth Birthday*”為標題，有這樣的文字：

Our origins were humble, and, for a Boys' School, somewhat peculiar. Mrs. Smith, the wife of the first Bishop of

3 Stewart, Frederick, Inspector of Schools' Report for 1873.



Hong Kong, started in 1860 a ‘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 which by 1868 was a failure because there was not sufficient demand for western education for Chinese girls. So in that year the second Bishop, Alford, took the School ‘under his immediate superintendence’, and with the help of leading citizens of the Colony, from the Governor downwards, issued an Appeal which was so successful that the 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 under a new constitution, was begun in September 1869, with twenty-three boys and girls.⁴

我們的起源很不起眼，對於一所男校來說，甚至有點奇怪。香港首任會督之妻施美夫夫人於 1860 年創辦了「女仔館」。1868 年，該校到遭遇失敗，原因是中國女孩對西式教育的需求不足。因此在同一年，第二任會督柯爾福將該校置於他的「直接管理」之下，並在殖民地總督以下的公民領袖協助下發出了呼籲。該呼籲非常成功，以致曰字樓孤子院依據新法案於 1869 年 9 月開張，當時男女生共有 23 名。

奇怪的是，這段文字和施牧的致詞，兩者之間其實有一個重大的差異。——那就是施牧認定男拔萃的創校年份為 1860 年（與女拔萃相同），而非傳統的 1869 年。

1930 年，男拔萃費瑟士東校長 (Rev. William Thornton Featherstone, 1886–1944, 1918–1931 在任) 首度編纂校史，將 1860 年開辦的學校稱為「第一建校期」(First Foundation)

4 “Editorial: Our Eightieth Birthday”, *Steps*, July Issue of 1949, p.1.



的女仔館 (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只視作男拔萃的先驅 (forerunner)；而 1868 年，女仔館因經營不善結業，會督翌年在原址另建曰字樓孤子院 (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是為「第二建校期」或「現行建校期」(Second and Present Foundation)，⁵ 如此認知在費牧上任以前便已形成，故男拔萃的歷史敘述，一向把創校年份定於「第二建校期」開端的 186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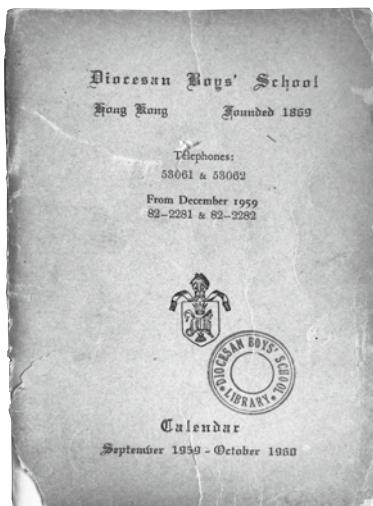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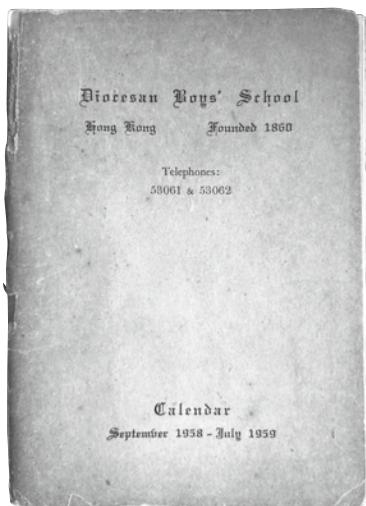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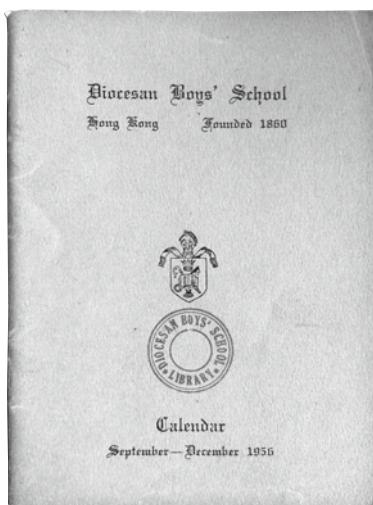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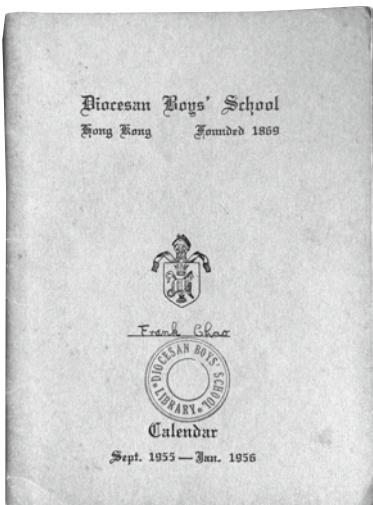
其實早在上任之初，施牧似乎已經調整了男拔萃的創校年份。最顯著的是學生人手一本的校曆 (School Calendar)。1955 年秋季號，封面的創校年份尚為 1869 年；至 1956 年秋季號，則已改為 1860 年。直到 1959 年秋季發行的全年號，又改回 1869 年。是什麼原因促使施牧在任期內兩度調整創校年份，往復於 1860 年與 1869 年之間？十分耐人尋味。筆者以為，這可能涉及兩所拔萃校長間的一次爭論。根據男拔萃舊生會於 2004 年發行的 135 週年晚會場刊所載：

Canon She was embroiled in a heated debate with Dr. C. J. Symons, the Headmistress of DGS over the founding year of their respective schools. The Bishop intervened and it was finally agreed that DGS would be allowed to use the year 1860 as her founding year. Hence, the year 1869 officially became the year in

5 Featherstone, W. T.,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 Hong Kong: The History and Records 1869-1929*, Hong Kong: Ye Olde Printerie Ltd, 1930, pp.126-127. 按：後文一律簡稱 *The History and Records of DBSO*。

往復於 1860 與 1869

029



校曆的書影。可見 1955 年至 1959 年間兩度調整創校年份。



施玉麒



1967 年西門士夫人與聖士提反男校校長 Mr. Melluish 合影





which DBS was founded.⁶

施牧與女拔萃校長西門士就各自學校的創校年份展開了激烈爭論。會督居中調停後，最終確定女拔萃的創校年份為1860年。由此，1869年正式確定為男拔萃的創校年份。

這段追述文字，已無法道出施牧與西門士夫人(Dr. Catherine Joyce Symons, 1919–2004, 1953–1985在任)當年爭論的詳情；但爭論最後由何明華會督(Bishop Ronald Owen Hall, 1895–1975, 1932–1966在任)居中調停，則無疑問。這場爭執應該與男拔萃方面兩度更改創校年份有很大關係。進而言之，如果兩校在何督調停後僅是各自表述、互不干涉，那麼施牧根本毋須在1959年時再度更改創校年份。如此更改，可能因為何督調停後的決議之一，乃是兩校不得共享同一創校年份。

那麼，女拔萃與1860年成立的女仔館，又存在着怎樣的關聯呢？根據男拔萃校長俾士(George Piercy, 1856–1941, 1878–1918在任)於1918年1月30日的頒獎日演講所言：

Coeducation not proving suitable for Hong Kong, in March, 1878,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receive no more boys, but those already admitted should remain; this decision was reversed in July,

⁶ DSOBA, *DBS 135th Anniversary*, Hong Kong: DSOBA, 2004, p.13.





1878, and no more girls were received as boarders after 1880, though they still remained as day-scholars. All girls left when Fairlea School, under the superintendence of Miss Johnstone, was opened to them in 1892; the Diocesan Girls' School was opened in 1900.⁷

1878 年 3 月，校董會認為男女合校在香港不適用，遂決定不再招收男生，但在讀男生仍可就讀；1878 年 7 月，該決策遭到翻轉。1880 年之後，學校不再招收女宿生，但女生仍可走讀。1892 年，所有女生轉去由莊思端女士主持的飛利女校；1900 年，拔萃女書室創立。

換言之，曰字樓孤子院由 1869 年一開始的男女兼收，至 1892 年轉型為男校。這段時期，校內女性教育事業逐漸變得次要，至告中斷。八年後的 1900 年，會督才開設女拔萃，以恢復女性教育事業。然而，對於女仔館的認知，女拔萃似乎有一個變化過程。簡而言之，在 1930 年代以前，女拔萃往往會把自身的創校年份定於 1900 年，而以女仔館的後裔 (descendent) 自居；⁸ 此後則直接將女仔館視為本校歷史的一部分。如 1937 年蘇雅校長 (H. D. Sawyer, 1884–1965, 1925–1939 在任) 在頒獎日致詞道：

It was founded in 1866 (or about that date) for children of

7 Featherstone, W. T., *The History and Records of DBSO*, p48.

8 “Diocesan Girls’ School: To Be Opened To-Da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10th, 1913.

